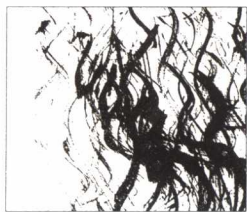


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



陈伯海○主编

东方出版中心

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 / 陈伯海主编. —2 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8

ISBN 978-7-80627-050-9

I. 近… II. 陈… III. 文学思想史—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2279 号

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70 千

印 张: 36.5 插页 2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27-050-9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论 自传统至现代	001
-----------------	-----

第一编 17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第一章 两大思潮的激荡	031
第一节 晚明个性思潮	031
第二节 清初实学思潮	041
第二章 尊情说的流行	058
第一节 万物有情的宇宙观	058
第二节 大悲大愤出至文	063
第三节 体察七情的新文学	068
第四节 一情与众情	074
第三章 独创精神的高扬	083
第一节 在复古主义羁绊下	083
第二节 性灵派的革新旗帜	088
第三节 唐宋派的牢固根基	092
第四章 人与文的俗化	099
第一节 生活方式的趋俗	099
第二节 文艺观念的崇俗	102
第三节 诗文创作的融俗	106
第五章 创作倾向的崇实	114
第一节 时代实录	114
第二节 以诗补史	119

第三节 文贵益世	123
第六章 作家主体的坚实	128
第一节 坚贞的气节	128
第二节 深厚的学力	131
第三节 坎坷的阅历	135

第二编 18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第一章 时代与文化特征	143
第一节 时代特征	143
第二节 文化特征	155
第二章 复古思潮回流	163
第一节 复古思潮的重兴	164
第二节 复古思潮的高涨	169
第三节 复古思潮的延续	176
第三章 性灵思潮崛起	189
第一节 性灵思潮的流变历程	191
第二节 袁枚：性灵思潮的一面旗帜	202
第三节 性灵思潮的近代倾向及其评价	205
第四章 人文思潮潜流	212
第一节 人文思潮波澜初起	214
第二节 人文思潮的曲折与受阻	222
第三节 人文思潮的潜升	224

第三编 19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第一章 交错涌动的文学思潮	237
第二章 经世致用的文学	244
第一节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244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	251

第三节 经世致用文学思想的转化	259
第三章 学习西方	273
第一节 传教士的工作	273
第二节 以中化西	278
第三节 学习西方的深化	285
第四节 审美意识的变化	291
第五节 语言与形式	296
第四章 人文精神的曲折发展	305
第一节 人的意识朦胧觉醒	305
第二节 人文精神的发展	313
第三节 改良礼教	321
第五章 文学的通俗化	332
第一节 俗文学的崛起	332
第二节 文学运行机制的变革	340
第三节 俗化大潮下的雅俗渗透	347
第六章 复古思潮的末路	359
第一节 形形色色的复古	359
第二节 近代西学输入后的复古思潮	362
第三节 复古思潮的衰亡	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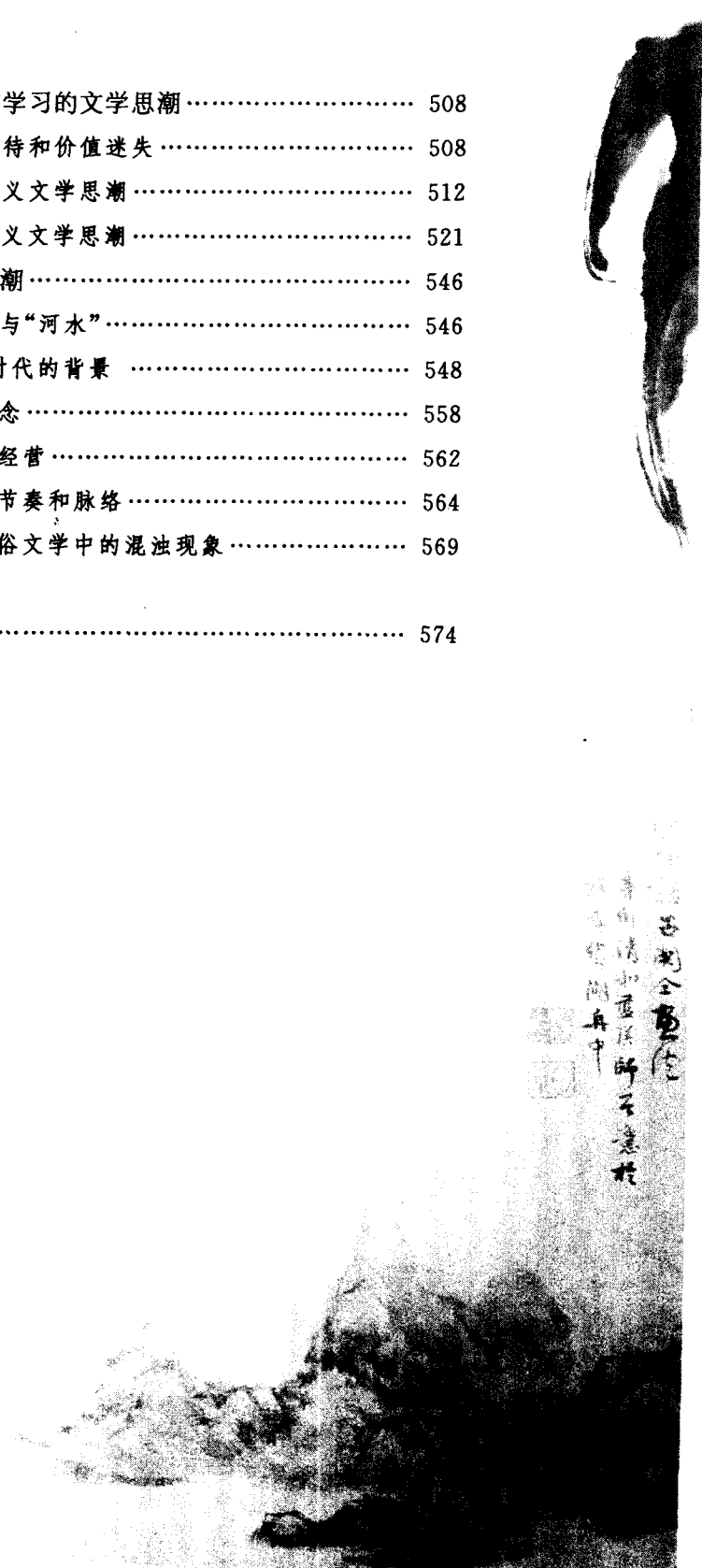
第四编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第一章 20 世纪的语境	373
第一节 现代化——一个世纪之梦	373
第二节 思潮纷纭	381
第二章 “五四”“革命文学”思潮	384
第一节 “五四”——时代的转折点	384
第二节 胡适、陈独秀共举“文学革命”大旗	388
第三节 周作人与“人的文学”	396
第四节 鲁迅——“文学革命”实绩的体现者	399

第五节	茅盾与文学研究会、现实主义	403
第三章	左翼“革命文学”思潮	410
第一节	方向转换	410
第二节	国际上“左”倾文学思潮	414
第三节	中国文坛上“左”倾文艺思潮	415
第四节	鲁迅、茅盾坚持的现实主义	419
第五节	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两类文本	426
第四章	工农兵文艺思潮的兴起	434
第一节	救亡文艺思潮腾起	434
第二节	现实主义要求重现	437
第三节	关于“民族形式”	439
第四节	一股非工农兵文艺思潮的涌动	441
第五节	工农兵文艺思潮的确立	448
第六节	胡风与七月派文学思潮	455
第五章	工农兵文艺思潮的演化	467
第一节	1949~1956年	467
第二节	1957~1965年	471
第六章	工农兵文艺思潮的蜕变	480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风暴	480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文本	482
第七章	新时期文学人文思潮的回归与发展	487
第一节	自上而下的正本清源	487
第二节	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	490
第三节	开放吸纳	493
第四节	新时期文学文本	495
第八章	“自由主义”派文学思潮	498
第一节	新人文主义思潮	498
第二节	现代评论派,新月派	500
第三节	“自由人”、“第三种人”和论语派	502
第四节	西方美学	505

第九章 关于向西方学习的文学思潮·····	508
第一节 虚位以待和价值迷失·····	508
第二节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512
第三节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521
第十章 通俗文学思潮·····	546
第一节 “井水”与“河水”·····	546
第二节 社会、时代的背景·····	548
第三节 文学观念·····	558
第四节 商业化经营·····	562
第五节 流行的节奏和脉络·····	564
第六节 关于通俗文学中的混浊现象·····	569
后记·····	574

古训全案
身自清如蓝溪所不意於
不在此間真中



导论 自传统至现代

—

我们这里所说的“400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四个世纪，而是泛指自16世纪晚期（大致相当于明万历年间）至20世纪末叶这个时段里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这400年光景的文学进程，在一般文学史著录中，是把它分别切割为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来处理的，为什么要合并在一个题目下加以论述呢？因为据我们看来，近400年文学思潮的演进，尽管头绪纷繁，事象庞杂，总体上却构成了统一的流程，其实质便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这样一个特定的观照视角，自然需要打破原有的分界，对历史作出新的概括。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正式诞生于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五四”时期。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倡导和促成的中国新文学，无论在观念情趣和文学体貌上，都和传统文学存在着重大差异。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思想否定旧思想，形成“五四”文学革命乃至整个文化革命的主题；而引进西方的观念、方法以至文学样式，则成为新文学自身建设的重要凭藉。基于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习惯于用“外来影响”来解释新文学的产生，甚至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只不过是西方文学的移植，它和传统割断了联系，这个看法值得商榷。

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复杂性，“五四”文学革命确实是在

反传统的旗帜下进行的,而其倡导者们的激烈言辞(有时不免过激),更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但只要不拘泥于辞句外表,能够深入一步剖视其实际的思想动向,当可发现,其所谓“反传统”,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集矢于封建礼教(以“孔教”为代表),在文学层面上亦着重在封建正统文学(如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并不含有全盘否定传统的意思。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在大力推进“反传统”路线时,仍很注意从传统中识别和寻求养料,用以为构建、发展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依据。如鲁迅的倡扬民间文艺和民俗风情,周作人以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性灵”文学为新文学源头,胡适到清人顾炎武以至戴震的学说、理论中去发掘科学实证精神(梁启超开其端绪),又认白话文学的种子早已潜伏在唐宋诗词和宋元小说、戏曲创作里(见其《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及稍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等称明清之际一批进步思想家为“早期启蒙主义者”,开启了近代启蒙思想文化的先河。这些事例表明,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曾“数典忘祖”,在敞开胸怀吸收和借鉴外来思想文化的同时,仍坚持将目光指向自己的传统。换句话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血肉联系,是自觉地被意识到和把握到的(尽管由于立场不同,各人所指亦有偏侧)。这一点在讨论“五四”文学“反传统”时,似不应忽略。

再从文学史演变的事实来看,“五四”文学革命也并非单凭少数人登高一呼,或输入几个外国的新名词、新观念,就能鼓动起来的,它有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早在其30年前,约当戊戌变法前后,传统的文学观念就已经发生变化;当时文坛上“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提出,戏曲改良的风行,“新民体”和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兴起,都在为文学的大变革创造条件,从而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的前驱,虽然其力度和亮色不可同日而语。更往上溯,我们还能发现,晚清时期的文学变局实肇始于清中叶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和文学思潮的蜕变,而蜕变的根子则又远远埋藏于明清之际社会格局和文化精神的变动之中。就这样,以“五四”新文学为出发点,通过一步步追根溯源,当能具体揭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理出一条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贯串线索来。

还要看到,“五四”新文学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却并非它的完成。“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经历了长期而又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此行程中,“五四”文学革命所奠定的人文精神和文学作风有所变异,有所分化,有所高扬,有

所坠失,这种种变化固然同社会历史变革的大形势紧密相关,而亦和新文学自身所承受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分不开。也就是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交替纠葛,不仅存在于新文学孕生之前,即便在其诞生后的相当时间内,仍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因此,回顾和总结新文学自身的演变历程,并将其置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由传统至现代演进的轨迹中加以考察,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把晚明以迄当今近400年的文学思潮作为整体的流程进行探讨,根据就在这里。

当然,400年的思潮变迁不能“一锅煮”,还须分出段落层次来。依照我们的构想,可以大致区别为四个阶段:

(1) 明万历初至清康熙前期(1573~1683),是从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内部孕育出近代意识萌芽的阶段;

(2) 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末(1684~1795),是复古思潮卷土重来和新思想萌芽在重重禁锢下潜滋暗长的阶段;

(3) 嘉庆初叶至“五四”前夕(1796~1915),是在古今更迭和中西交汇双向撞击之下,新倾向开始突破旧传统,旧文学逐渐向新文学过渡的阶段;

(4)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当前(1915~),则是在中国社会革命形势引导下,新文学得到初步确立,并通过不断分化与组合曲折前进的阶段。

四个段落,每段历时百年左右,大体相当于17、18、19、20这四个世纪,各有自身的特色和文学思潮演变中的独特位置,总合起来,便构成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全过程,而其演进的趋向至今仍在继续之中。这样的划分不能不是十分粗略的(实际上,每一大段还可按内部思潮的起伏划出若干小段),用作划段的界标更只有极其相对的意义,因为思潮的前后推移和相互渗透决不能拿时间坐标或其他刚性标记加以截然分割。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倚仗眼前的这副脚手架,来测断历史新陈代谢的形迹,以进入其内在运行的机制。

二

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必然有其特定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本结构、文

体风貌乃至批评范式和理论构架,以示区别于之前或之外的其他文学思潮,并把从属于自身的众多文学现象联结成一个整体。在这诸方面特征中,文学观念尤为重要,它决定着创作和批评的路向,规范着文学潮流的渠道,从而呈现为整个思潮的主导性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思潮无非就是一种文学观念的显现。

但是,所谓“观念”,实际上还包含两层意思。“文学是人学”,人作为文学的主体,构成文本的深层结构;任何文学创作和批评,在显示其文学观念时,都不能不涉及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文学又是文学,它有自身独特的体性和职能,有其在人生大系统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存在价值,不能混同于普通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形态,这也是谈论文学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人”的观念和“文”的观念,合组成文学的人文核心,它是特定文学思潮既联系而又区别于一般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主要表征。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也必须从探索其人文核心的变动入手。

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核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所萌动的呢?比较有把握的回答,应该是在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末叶,亦即晚明以迄清初的这段期间。这是一个社会生活充满动荡、变革的时代。明中叶以来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壮大及其生活情趣的普泛化,政治斗争的尖锐和王朝鼎革间的社会大动乱,理学的危机和异端思想的抬头,雅俗文化的对流与中西学术的初次碰撞,以及处在如此复杂多变环境里的士人心态的狂放与抑郁,这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条件的结合,正好为新的人文核心的萌生提供了温床,使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艺术、文学放射出异彩。近世学者如梁启超、胡适、周作人、侯外庐等,在探究近代思想文化的渊源和新文学的源头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这段时空上来,并非出于偶然。但梁、胡、周诸人或着眼于古典复兴,或注重在科学实证,或一味崇尚文学抒写性灵,皆不免偏于一隅之见;比较而言,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从思想史的总体演进上立论,说法自然要圆到得多。不过“早期启蒙主义”的提法仍有缺陷,不仅容易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相混同,还存在着将明清之际一大批趋向进步而情趣互异的人物阑入一堆的毛病。实际上,认真辨析一下,列于“启蒙”名下的至少有两股不同的社会思潮,一是晚明个性思潮,再一是明末清初的实学(经世致用)思潮,它们各自在文学领域中留下独特的印记,虽有

交汇而又不容混淆。

先来看个性思潮。必须指出,张扬个性人格或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并非晚明特有的现象。传统儒家如孔子便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①,孟子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②的教言,而其人格精神的内涵乃是要恪守宗法伦理规范,谈不上什么个性自由。倾向于蔑视礼法、纯任个性的如庄子和一部分玄学之士,则又将“自由”局限在逍遥自适、自然无为的境界里,分明染有遁世乃至玩世的色彩,亦不属近代意义上的个性要求。与之不同,晚明个性思潮是从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理欲之辨”发展而来的。针对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训条,晚明一些具有叛逆精神的人士如李贽、何心隐等,大胆提出以“欲”为人的自然本性,让“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③的主张,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他们所说的“欲”,主要指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即所谓“百姓日用”),而亦包含某些精神需求的成分(如情爱)在内。肯定这些需求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全面实现个性自由,但用自然人性(“人欲”)来打破义理人性(“天理”)的束缚,减轻封建纲常伦理对人的才性的严重压制,在当时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而且,从肯定人的物质需求出发,将会逻辑地导出对其他社会需求、政治需求、精神需求的多方面追求,最终导致独立自主的个体人格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建立,这就走向了近代。当然,在晚明思潮中仅只微露端倪,远未达到近代启蒙思想的高度。

个性思潮在明中叶以后的文学中有着鲜明的表现。早在弘治、正德年间,以祝允明、唐寅为代表的吴中才子,即以其疏狂脱略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隆庆前后,徐渭持作诗必“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④的论调,开了晚明“性灵”文学反“前后七子”的先声。但作为一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潮流,则要到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和公安“三袁”等联袂登上万历历史舞台方始告成。李贽倡“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而“童心”即是不杂后天习染的“道德闻见”、“绝假纯真的自然人性”^⑤。公安“三袁”主“性灵”,求新变,宣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⑥、“信腕信口,皆成律度”^⑦,对于笼罩明初以来文坛的拟古作风给予迎头痛击。汤显祖重才情,有“尊情抑理”的倾向,他反对理学家“离情而言性”^⑧,自述从事戏曲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为情作使,免于伎剧”^⑨,甚且用“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来嘲讽那种“以理格情”的冬烘头脑^⑩。冯梦龙亦曾鼓吹树

立“情教”以代替礼教^①，尤其关切市井小民的情感生活，所撰拟话本小说集“三言”中，有不少篇章真切摹写世故人情的曲折悲欢，热诚歌颂情意和谐的人生理想，成为市民文学里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以肯定人的“利”“欲”、发扬人的“才”“情”为核心的个性意识和师心、求变、尊情、向俗的文学潮流，便在晚明文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弥漫开来，一时几有燎原之势。

然而，晚明个性思潮的势头并没有长久保持下去。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政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得这一点点的苗子很快遭受摧残。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被迫害致死，争取个性自由的锋芒便逐步减弱。万历后期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作家，在接过“性灵”文学口号的同时，却将公安的“率性而行”改变为“保此灵心”^②，而所谓“灵心”又特指诗人超越尘俗的“孤怀”、“孤诣”或“幽情单绪”^③，这一来，伸张个性的取向，便由狂者式的进取转成了狷者式的退避。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社会危机加剧，实学思潮炽盛，个性的呼叫更形低沉。只有在经历时代巨变的清初，那种家国沧桑、韶华痛失、理想破灭的感受，才会凝聚人们心头，酿成文学中浓重的感伤情味，算是晚明个性思潮的余波荡漾。而待到事过境迁，感伤逐渐淡化，便只剩下王士禛以“神韵”论诗和浙派词人以“清空”解词那一点空灵的气息。就这样，从积极地发扬才性，到消极地保持“灵心”，再到个性追求幻灭后的感伤和感伤消解所余下的空灵，作为建构新人文精神第一波的晚明个性思潮，走完了它自身由兴起到衰亡的整个行程。

现在来看实学思潮。“实学”一词，创始于两宋理学家，用以批评佛老的虚空出世，标榜儒门认天理人伦为实体并加践履躬行的宗旨。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切实用，不免遭受讲求事功者的讥弹，于是明清人多用“实学”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扬实事实功、实证实行。明清实学思潮在起源上颇为庞杂。大致说来，明中叶以来理学界倡导“气本”说的非主流派人士如王廷相、罗钦顺，“左派王学”中对“百姓日用”的关注如王艮、李贽，一部分重视实证的考据家如杨慎、陈第、焦竑，接触和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如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以及某些主张“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如丘浚、张居正、吕坤，都对实学思潮的兴起发生过影响。但这一思潮的成形则要以明末东林党、复社、幾社诸君子(顾宪成、张溥、陈子龙等)为标志，而以清初诸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为高峰，并衍其余波于后学唐甄、李燾等学

说中。到康熙中叶,清王朝统治趋于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失落了其反思、批判的品格和经世致用的功能。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可以用博学、审思、致用三句话加以概括。由于博学,便注重实证,不尚空谈,开了有清一代的治学风气;而且所学不限于书本知识,举凡天文地理的勘测、民情风俗的调查、生产经验的总结、社会沿革的考察,皆包括在内,从而为近代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种子。由于审思,着眼于历史兴亡的探讨,必然会触及封建制度的某些本质方面(如君主专制、贫富分化、土地兼并),尽管其哲学观和政治观尚未能越出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大框架(甚至带有宗经复古的味道),而就其揭示问题的尖锐和批判现实的深度来说,都有超轶前人、启发后来之处,致使近世反封建革命者们每常引为同调。又由于致用,则博学、审思均须紧密结合社会人生,更加强了其实践的性能。应该说,经世致用并非什么新鲜的口号,传统儒家标举“内圣外王”,即含有经世致用成分在内。但儒家以“内圣”为“体”,以“外王”为“用”,不免崇道德而略事功。到宋明理学一以性理为尚,更容易看轻实事实功。明清实学思潮不仅恢复和发扬了长期遭受冷落的事功之学,还将反思、批判、实证、实行的时代精神注入其间,使经世致用的内涵起了深刻的变化,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实学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主要在于促进文学面向人生。首先是强调为现实人生服务,所谓“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④，“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⑤，即其文学主张的根本立足点。其次是重视文学抒述愤懑、批评时政的作用，如黄宗羲一再称道《诗经》“变风”“变雅”的“怨刺”精神，谓其“疾恶思古，指事陈情”，“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方足以“感天地而动鬼神”^⑥。而要做到以上两点，又需要作家熟悉社会、了解世相，凡“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虽市侩优倡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鄙亵之故，必皆深思而谨识之，酝酿蓄积”，发而为文^⑦。另外，对于时代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也有比较独到的认识，特别是提出“厄运危时生至文”的观点，将文学的兴盛归因于社会矛盾冲突、动荡激烈^⑧，不能不说是传统风教说的重要突破。与上述理论见解相适应，这一时期诗文创作中关注民瘼、体察世情、揭示阶级矛盾与民族斗争的篇章大量出现，戏曲小说搬演时事、指斥权奸、综述历史兴亡和治政得失成为新的动向，它们不仅在题材的开拓、立意的

精警、写照人生和批判现实的广泛与直切上上了一个台阶，即就体验的深沉、摹写的精细、表达手段与形式的多样化而言，亦有不少显著的进步。这些都应看作明清实学思潮对文学事业的推动。

尤须注意的是，实学思潮和个性思潮原本是两股不同质性的潮流，后者倡导“师心”，更多地带有新兴市民要求思想解放的色彩；前者注重“习学”，基本上属于封建末世士大夫挽救危亡心态的显影，但两者在交互激荡中也有汇通。个性思潮从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出发，涉及“百姓日用”的关注，就有了实事实功的倾向；实学思潮曾严厉批评李贽等人放纵情欲，祸殃天下，而亦承认“天理”不离乎“人欲”。王夫之说：“天理人欲，同行异情”^①，“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②，还说：“害人欲者，则终非天理之极至”^③，这跟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论调是很有差别的。但他不赞成放纵个人情欲，而提出“天下之公欲即理”^④的命题，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天下之理得，则可以给天下之欲矣”^⑤，实质上是要协调各个个人分散的利益、需求，以实现社会公众共同的利益、需求。顾炎武所说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⑥，黄宗羲宣扬的“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⑦，尽管立论角度重在治政，也含有重新界定群己关系、力图将个体价值与整体规范相结合的意味。黄宗羲更将这一思考贯彻于文学批评，他吁请诗人不要局限在“私为一人之怨愤，深一情以拒众情”，而要让个人的感慨不平“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以体现“悲天悯人之怀”，这才能从“一时之性情”提升为“万古之性情”^⑧。这类主张已经接近于近代意义上的群体意识，它同晚明个性思潮中萌发的个体意识相并列，分别构成近现代文化人文核心的两个基本的生长点。

三

历史行进至 17 世纪末叶，时代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康熙二十年（1681），清政府平定延续已久的“三藩之乱”，解除了内部的隐患；二十二年（1683）攻克台湾，消灭郑氏政权，实现了全国统一。至此，明清易代最终宣告完成，其后 100 年间，中国社会进入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全盛时期——康乾盛世。在这个阶段里，全国经济逐步发展，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文化事业也有相



应的发达。与此同时,清王朝全面推行文化统制政策,倡理学,禁结社,开“博学宏词”科,修《四库全书》,兴“文字狱”,交替使用高压与笼络两手,使专制主义政治得到空前强化。这样的文化氛围,自然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关注现实,于是前一阶段风行的个性思潮和实学思潮便只能萎缩下去,规随传统、复兴传统的复古倾向重又成了时代主流,它充分表露出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精神的巨大惰性和变革过程的艰难曲折。

18世纪的复古思潮,从总体上说有两大支脉,即“宋学”与“汉学”。前者直承自宋明理学(以程朱一派为正宗),是传统思想文化的回光返照,以其正好适应清王朝巩固和加强专制政治的需要,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有清一代的官方学术。后者打出振兴古文经学的招牌,实际由清初实学思潮转形,却阉割了其经世致用的主旨,也缩小了实证的范围(脱离社会实践,专一在古书堆里讨生活),带有盲目崇古的趋向(吴派较皖派尤甚)。它们都是对17世纪新思潮的反动,但在整理古代文献、总结传统思想文化方面,仍作出一定的贡献。而由于学术门径的不同(一主义理,一主考据)和政治职能的区别(重在“帮忙”或重在“帮闲”),相互间也常发生矛盾,酿成所谓“汉宋门户之争”,其势力亦有消长起伏。大致说来,宋学在18世纪前期(康、雍、乾之交)占据主导地位,汉学则鼎盛于18世纪中叶以后(乾、嘉之间);由宋向汉的推移,预示着清王朝统治的由盛转衰。

宋学与汉学虽起源于学术文化领域,而作为特定的社会思潮,又曾给予文学以直接影响。康乾之交,沈德潜继王士禛后领袖诗坛,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崇尚体正声雄的盛唐“格调”,即是为了与宋学思潮相呼应,以开启清代诗学的“盛世之音”。散文界则有方苞创立桐城派古文,以“义法”说为理论核心,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②,亦可见其祈向之所在。“格调”论诗学和桐城派古文是清代正统文学的代表,它们在渊源上分别上承“明七子”和归、唐诸家复古思想的余绪,但不像其前辈那样偏于诗文形体的模拟,却更重在文学精神的复古,尽管其宗奉封建道统、桎梏才人性灵的痼疾依然存在,而学习传统的门径较宽,方法较为多样,拟议以成变化的作风也比较明显。像沈德潜教人作诗要“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③,并不仅限于“格调”一端;其所选诗在推尊盛唐的前提下,亦能兼顾各类风格的变异。桐城派到刘大櫆时,已觉“义法”不足以概括文章之能事,进